

THE
INVENTION
OF ENTERPRISE

历史上的企业家精神

从古代美索不达米亚到现代

戴维·兰德斯 (David S. Landes)

[美] 乔尔·莫克 (Joel Mokyr) ◎编著

威廉·鲍莫尔 (William J. Baumol)

姜井勇◎译

*Entrepreneurship from
Ancient
Mesopotamia
to Modern Times*



中信出版集团 · CHINACITICPRESS

THE INVENTION OF ENTERPRISE

历史上的企业家精神 从古代美索不达米亚到现代

[美] 戴维·兰德斯 (David S. Landes) 乔尔·莫克 (Joel Mokyr) 编著
威廉·鲍莫尔 (William J. Baumol) 姜井勇译

*Entrepreneurship from
Ancient
Mesopotamia
to Modern Times*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历史上的企业家精神：从古代美索不达米亚到现代 /

(美) 兰德斯, (美) 莫克, (美) 鲍莫尔编著, 姜井勇译.

—北京: 中信出版社, 2016. 1

书名原文: THE INVENTION OF ENTERPRISE

ISBN 978-7-5086-5551-2

I. ①历… II. ①兰… ②莫… ③鲍… ④姜… III.

①企业家—研究 IV. ①F272.9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5) 第 236294 号

THE INVENTION OF ENTERPRISE by David S. Landes, Joel Mokyr, and William J. Baumol

Copyright © 2010 by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No part of this book may be reproduced or transmitted in any form or by any means, electronic or mechanical, including photocopying, recording or by any information storage and retrieval system, without permission in writing from the Publisher.

All rights reserved.

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 2015 by CITIC Press Corporation

本书仅限中国大陆地区发行销售

历史上的企业家精神：从古代美索不达米亚到现代

编 著: [美] 戴维·兰德斯 乔尔·莫克 威廉·鲍莫尔

译 者: 姜井勇

策划推广: 中信出版社 (China CITIC Press) + 《比较》编辑室

出版发行: 中信出版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市朝阳区惠新东街甲 4 号富盛大厦 2 座 邮编 100029)

(CITIC Publishing Group)

承 印 者: 北京鹏润伟业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87mm × 1092mm 1/16

印 张: 43

版 次: 2016 年 1 月第 1 版

京权图字: 01-2011-6542

书 号: ISBN 978-7-5086-5551-2/F·3497

定 价: 88.00 元

字 数: 660 千字

印 次: 2016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广告经营许可证: 京朝工商广字第 8087 号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凡购本社图书, 如有缺页、倒页、脱页, 由发行公司负责退换。

服务热线: 010-84849555 服务传真: 010-84849000

投稿邮箱: author@citicpub.com

“比较译丛”序

2002年，我为中信出版社刚刚成立的《比较》编辑室推荐了当时在国际经济学界产生了广泛影响的几本著作，其中包括《枪炮、病菌与钢铁》、《从资本家手中拯救资本主义》、《再造市场》（中译本后来的书名为《市场演进的故事》）。其时，通过二十世纪九十年代的改革，中国经济的改革开放取得阶段性成果，突出标志是初步建立了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框架和加入世贸组织。当时我推荐这些著作的一个目的是，通过比较分析世界上不同国家的经济体制转型和经济发展经验，启发我们在新的阶段，多角度、更全面地思考中国的体制转型和经济发展的机制。由此便开启了“比较译丛”的翻译和出版。从那时起至今的十多年间，“比较译丛”引介了数十种译著，内容涵盖经济学前沿理论、转轨经济、比较制度分析、经济史、经济增长和发展等诸多方面。

时至2015年，中国已经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跻身中等收入国家的行列，并开始向高收入国家转型。中国经济的增速虽有所放缓，但依然保持在中高速的水平上。与此同时，曾经引领世界经济发展的欧美等发达经济体，却陷入了由次贷危机引爆的全球金融危机，至今仍未走出衰退的阴影。这种对比自然地引发出有关制度比较和发展模式比较的讨论。在这种形势下，我认为更有必要以开放的心态，更多、更深入地学习各国的发展经验和教训，从中汲取智慧，这对思考中国的深层次问题极具价值。正如美国著名政治学家和社会学家李普塞特（Seymour Martin Lipset）说过的一句名言：“只懂得一个国家的人，他实际上什么国家都不懂”（Those who only know one country know no country）。这是因为只有越过自己的国家，才能知道什么是真正的共同规律，什么是真正的特殊情况。如果没有比较分析的视野，既不利于深刻地认识中国，也不利于明智地认识世界。

相比于人们眼中的既得利益，人的思想观念更应受到重视。就像技术创新可以放宽资源约束一样，思想观念的创新可以放宽政策选择面临的政治约束。无论是我们国家在 20 世纪八九十年代的改革，还是过去和当下世界其他国家的一些重大变革，都表明“重要的改变并不是权力和利益结构的变化，而是当权者将新的思想观念付诸实施。改革不是发生在既得利益者受挫的时候，而是发生在他们运用不同策略追求利益的时候，或者他们的利益被重新界定的时候”^{*}。可以说，利益和思想观念是改革的一体两面。囿于利益而不敢在思想观念上有所突破，改革就不可能破冰前行。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当今中国仍然是一个需要思想创新、观念突破的时代。而比较分析可以激发好奇心、开拓新视野，启发独立思考、加深对世界的理解，因此是催生思想观念创新的重要机制。衷心希望“比较译丛”能够成为这个过程中的一部分。

钱颖一

2015 年 7 月 5 日

^{*} Dani Rodrik, “When Ideas Trump Interests: Preferences, Worldviews, and Policy Innovations,” NBER Working Paper 19631, 2003.

前言

在理解企业家精神时，历史的重要性不容低估。透过历史，我们可以看到它无与伦比的塑造力、修复力及各种现象的复杂性；我们能更好地认识创业活动随时间推移而千变万化的特性，更多地把握社会和制度的复杂架构对企业家精神的深刻影响；我们还能更广泛地认识到企业家精神对个体和整个社会的影响。

近年来，经济学家越来越关注企业家精神，而对企业家精神的历史研究则为此提供了补充。经济学家大量阐述了企业的创立、发展和消亡，制度对企业家精神的影响，企业家的统计特征和个性特征，以及企业家精神在经济增长中的重要角色等。经济理论和模型为我们提供了许多洞见，但历史也为我们观察企业家精神提供了不同的视角。历史让我们能在更深层次上理解具体实例，探讨创业活动的各种特性，考究企业家欣欣向荣和不断壮大的环境，以及可能最重要的——领会和把握这些年来创新与企业家精神的模式和演变历程。

在增进对企业家精神的理解和鼓励创业活动中引领潮流的考夫曼基金会（Ewing Marion Kauffman Foundation），近年来将大量资源投入学术界的企业家精神研究，尤其关注经济学和历史研究。由于意识到企业家精神长期以来被历史学和经济学教科书所忽视，我们一开始就试图在学术界创建一门新学科。近年来，我们看到这项研究已远远超出了我们的早期目标。学术界对企业家精神的研究兴致盎然，所获得的成果不仅使我们受益良多，而且鼓励我们进一步深入研究。在考夫曼基金会，我们认为，公众要理解企业家精神对当今经济增长的重要性，就必须更好地了解历史上的企业家精神在经济增长中所扮演的角色。

特别地，作为追溯全球企业家精神演变历史的第一本著作，本书开拓了一个新的研究领域。本书跨越时空，为我们讲述了自美索不达米亚和新巴比伦到现在的企业家精神史，提供了来自中东、亚洲、欧洲和美国的大量见解。本书呈现的研究不仅证实了创业活动在整个历史上的普遍性，而且证实了它的历史变化以及对经济变迁和经济增长的更普遍的作用。

尽管各历史时期描述的创业活动千差万别，但它们之间也存在一些共性和共同主题。本书细致入微地剖析了影响企业家精神的各种变数。我们可以看到文化和宗教对企业家精神的不同影响，有时它们鼓励个人去追求创业梦想，有时却使这些创业梦想几乎不可能实现。我们对推动企业家精神的制度，包括合同法和专利体系，有了更多理解。我们认识到，促进经济增长的生产性企业家精神和利用各种机会谋取私利的非生产性企业家精神之间存在着冲突。最后，我们理解了复制型企业家与真正意义上的创新型企业家之间的区别，前者仅创造更多和自己所见相类似的业务，后者创造了新产品和新服务并改变了市场性质。正是这种理解使我们能从历史中获得大量公共政策方面的经验教训。我们发现了以往创业活动的“催化剂”和阻碍因素，从中了解到如何培育今天的创新型生产性企业家精神。

我们还可以在更宽泛的层面上，做进一步的解读：研究历史上的企业家精神，为我们开启了一扇窗口，便于我们理解跨文化、跨时间的创新与企业家精神的内在动力。虽然对企业家精神的解释多种多样，但它们之间的共性最终有助于我们理解人性和创业冲动。在这里，我们可以发现，自有记录的历史早期开始，人们一直对创造、创新和施展才华充满激情。我们知道，正是这种动力使人类社会得以达到目前的先进和复杂程度。

全面考察整个有记录的人类历史中的创业活动，为我们提出了新的研究方向，并鼓励我们沿着这条思路继续前行。事实上，本书每一章节都不过是特定时期和特定地区更深入复杂的企业家故事的一段序曲。更多地了解这些独特的历史时期，能使我们更好地理解企业家精神的驱动力、牵制企业家精神的障碍、企业家精神所产生的影响以及人类的本性。

本书也是考夫曼基金会新的“创新与企业家精神系列丛书”的第二本杰作。作为考夫曼基金会、伯克利加州大学创业研究中心（BCES）和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的合作项目，该系列丛书从跨学科、多方法的角度来研究企业家精神与创新。正如该系列丛书的第一本著作那样，本书既为该系列丛书设定了高质量标准和研究深度，又为其他历史学家提供了一个广泛的参考性研究议程。事实上，更深入地研究企业家精神不仅是洞悉政策问题的必要之举，还能使我们更好地认识自己是谁，我们是如何走到了当下。

卡尔·施拉姆
(Carl J. Schramm)

序 言

历史上的企业家

为什么要庆祝呢？他带了些什么胜利回来？

他的战车后面缚着几个纳土称臣的俘囚君长？

——莎士比亚《尤里乌斯·恺撒》，第一幕，第一场

本书的主旨

对不是历史学家的读者来说，阅读历史类书籍也许只是兴趣所致。这是因为，历史书中的故事人物往往比小说描写的还要英勇无畏、超凡脱俗。但是，赏心悦目并非本书的目的。相反，我们要研究一些假设，这些假设对社会整体福利的重要性非同一般。不幸的是，它们很难用诸如统计分析和受控实验等传统做法进行验证。似乎也只有历史才有望提供一些肯定或否定这些假设的证据。

简言之，第一个假设认为，如果没有企业家的参与，发明的实际应用价值及其对经济增长（至少在增长率和人均收入上）不可或缺的贡献，将远低于有企业家参与时的水平。但是，企业家的贡献远不止于此。若企业家精神只是“增长的另一种要素”，则数不胜数的发明无疑将“胎死腹中”。如果缺少企业家的参与，我们基本上无缘最近几个世纪以来史无前例的增长奇迹。第二个假设同第一个假设形成了鲜明对比。它认为企业家的活动并不总是生产性的，也不总是增长促进型的。事实上，企业家有时会破坏增长和繁荣。第三个假设认为，在任何特定时期的任何特定社会中，创业活动的作用方向都严重依赖于现行的制度安排，以及这些制度安排为促进、不促进甚至阻碍增长的创业活动所提供的相对报酬。构成本书的诸多研究，不仅出于对该主题的一般兴趣，而且试图对这三个假设进行阐释。

本文其余部分将略微深入地阐述上述假设，并解释为什么历史最有望为它们提供相关验证；也就是说，实证检验中常用的标准处理方法，在这一研

究领域可能并无用武之地。

不同创业活动的根本区别：一些假设

若人们单枪匹马地追求财富、权力和声望，我们便视之为正在从事创业活动。雇员替雇主做事的积极性通常是有限的，人们自主创业则不然，他们往往会表现出极大的积极性。显然，有两种重要机制在其中发挥了作用；为了方便，我们不妨称之为“再分配性企业家精神”和“生产性企业家精神”。前者的例子有很多，如侵略战争、盗窃、贿赂和寻租诉讼等。这里很重要的一点是，区别被认可的或合法的再分配形式（如对保护性关税的游说）和不被认可的再分配形式（如暴力犯罪）。即使在高度有组织的且“治理良好”的社会，也只有前者的践行者才能促进繁荣和赢得尊重。应该注意，许多这样的行为曾被认为是值得称赞的，其中的一些行为到目前仍然如此。事实上，竭力维护这些再分配秩序的人，通常会被看成英雄，受到人们膜拜。但在工业革命出现之前的几个世纪，情况开始发生了变化。在一些社会，尤其是佛罗伦萨和安特卫普，商人和金融家已深受人们的赏识。问题是这些城市通常很小，经常遭到贪得无厌的近邻的压制，特别是通过有害无益的再分配形式的压制。但在该时期之前，能提高经济体生产能力的创新型生产性创业活动似乎相对稀缺，也并未获得高度重视。

除看重凯旋的战士并轻视生产性努力的文化态度以外，还存在另一个支持再分配性活动的明确理由。从本质上看，成功的再分配性创业活动的报酬是显而易见的，而且也很直接。从敌对君主手中侵占的领土、扒手偷得的一个钱包或腐败官员收到的贿赂……对受益者而言，都是实实在在的收益。这同生产性企业家能获得的收益形成了鲜明对比，后者的贡献很大部分会被搭便车者攫取，过去如此，现在很大程度上仍是如此。^① 对于提高了经济体生产

^① Nordhause 给出了他对溢出效应的计算结果，表明创新者能获得的有效租金极为有限：“我用美国非农就业部门的数据作了估算，结果表明在创新产生的全部剩余中，创新者只能获得 2.2% 左右。这是因为，一方面创新者对创新收益的初始占有率非常低（约为 7%），另一方面熊彼特式利润的贬值率非常高（每年约为 20%）……在 1948—2001 年间，创新利润占资本重置成本的年均比率仅为 0.19% 左右。”（Nordhause, 2004，第 34 页）

能力的人，其收益通常是非常模糊的，何时能获得这些收益也较难估计；更有甚者，那些盗取了大部分收益的搭便车者通常隐蔽得很好，他们深藏不露，伺机而动。事实上，若这样一个体系运行良好，则生产率提高带来的大量（也许绝大多数）收益将会流向消费者，通常是国外居民。

道格拉斯·诺思（Douglass North）的研究表明，制度安排在决定收益结构中扮演着重要角色，所谓收益结构是指从事社会中的不同创业职业（entrepreneurial occupations）所带来的相对报酬。若诺思的结论确实成立，而且很难说这个观点不成立，由此可以推断，这些制度对决定创业活动在再分配性职业和生产性职业的配置中发挥着主要影响。直到英国工业革命之前，绝大多数国家在绝大多数时期的通行制度，均倾向于支持经济体中富于创业精神的个人从事再分配性活动。因此，与资本主义兴起相伴而来的收益结构的变化，似乎可被视为工业革命之后史无前例的经济增长的重要原因。在工业革命前，历史上从未有过这么长期的人均收入的迅猛增长，因此长期的缓慢增长必须得到解释。如我们认识到的，历史上并不缺少惊心动魄的大发明时代。但是，为何生产率和产出仍这么低，且增长得如此缓慢？本书的主要目的就是阐释这些核心问题，这不仅有助于改善穷国当前的处境，而且有助于引领富国走向未来。

为何采用历史研究法？

早就有人认为，除历史研究有望为该领域的假设提供验证之外，不存在其他的证据和分析资料来源。因此，有必要概括说明为什么采用历史研究法。但是，首先必须强调，中肯地对企业家精神进行统计分析的困难很容易被夸大。事实上，最近已有大量的经验研究文献，对企业家的个性特征、他们的活动、融资需求及心理倾向和收入等进行研究。不过，这些文献并未被用来验证从正式和非正式理论中得出的假说，更没有得出有关创新型企业家行为及其结果的宽泛假说，比如上文已提及的那些。

缺乏这类研究的主要原因在于发明所固有的本质属性，即发明必须是某种之前从未存在过的事物。当然，许多（若非绝大多数）创新都是市场上已有事物的近似替代。无疑，它们之间存在差异，但正像雪花一样，即使各不相同，我们也会发现对它们进行一些统计分析，比如对专利和伟大发明家的

传记进行统计分析，从中找出经验规律是不无裨益的。但发明终究必须是一种异质产品，这妨碍了两种标准统计分析方法的应用，即时间序列分析和截面数据分析。或者更一般地说，对相关性进行统计分析必须以足够多的同类样本为基础，以确保在两个样本集的变化中观察到的相互关系不会受偶然因素的影响。但是，就我们这里论及的创新型企业行为而言，具有内在可比性的类似数据集通常并不可得。

也许有人已注意到，类似的困难不仅阻碍了绝大多数微观经济理论背后的最优分析，也有助于说明为何缺乏一个正式的关于企业家精神的微观理论。最优计算至少需要对可选的目标决策进行隐性比较，而富于创新精神的企业家做出的目标决策通常不是能根据可量化和可比较这两个特性进行选择的确定的无疑的替代性备选方案集。相反，标准厂商理论的分析对象是有效运行的企业如何在可比选项中选择确定无疑的管理方案，在这样的企业里，企业家们已经完成了他们的使命，并离开这里开始创建新的企业。

鉴于理论和数据分析上的这些障碍，我们只能名正言顺地回到历史给我们提供的经验教训。当然，我们也意识到这种选择同样受制于各种不利因素。其中最严重的一点在于，我们不能对任何类似的事物进行受控试验，因此许多决定因素之间复杂的相互作用必定会影响观察到的事件或历史时期，使我们难以用直接评估的方法来分析这些事件和历史时期。但历史研究提供了其他研究不能提供的大量信息和见解。尤其是，它使我们可以思考与我们现今截然不同的社会环境，看看当时的人们是如何处世的。这非常类似于古生物学，在所有曾出现过的有趣物种中，只有极少部分存续到了现在，我们怎么才能知道关于巨蜥或10英尺长的树懒的生理机能呢？既然经济学的所有方法均存在缺陷和障碍，那就没有理由认为历史分析是一种毫无价值的研究方法。

因此，本书转向历史研究，试图从中了解企业家、发明及其传播和利用，以及它们对经济增长的影响。

一些新的结论

政策设计者可以从阅读本书中获得许多经验教训，这些经验教训可能有助于表明哪些制度和制度修正有望改善公共福利，促进发明和创新。但我们希望普通读者也能开阔眼界、陶冶情操，获得美的享受。例如，本书得出的

一个新结论是：在现代以前，那些处于生产性发明大繁荣时期的最具创造力的社会，在将这些发明用于实践时通常表现得很糟糕。亚伯拉罕·林肯（Abraham Lincoln）引用了罗马帝国的例子，尽管亚历山大港的古希腊数学家赫龙（Heron）发明了实用型蒸汽机，但除了作为玩物外，它并未被用作任何有突破性意义的生产工具。当然，军事发明和一些小玩意（多数由赫龙发明）得到了利用，它们被罗马祭司用作向信徒宣扬神力的手段。更令人震惊的是唐宋时期的中国，当时中国出现了大量的发明，如纺车、壮观的天文钟、印刷术和扑克牌等。确实，中国的许多发明，比如印刷术、纺织、造船和液压技术均得到了应用。但是，制度安排并未使这些发明结出硕果。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更早期的美索不达米亚和中世纪晚期（特别是12—13世纪）的欧洲，它们有着辉煌的建筑发明，创造性地将水磨（除用于研磨谷物外）用于锯木材和锻压金属、布料精加工、去橄榄核及其他事务；当时用到的水磨如此之多，以至塞纳河出现了交通阻塞。我们的基本假说看似能解释这一悖论：占有发明的人在应用发明时通常表现平平。这些假说表明，发明得不到应用的原因在于，发明得不到相应的报酬。在所有这些时期，主要报酬都给予了军用发明：更好的装甲、更好的城堡设计和一个能使长枪骑士更有效地策马前行的马镫。人们普遍认为，就铁、马、建筑和液压技术甚至食物保存均是“寻常”技术而言，存在的溢出效应或者军用和民用技术之间的界限比如今更模糊。有些时候，宗教当局会给发明提供报酬，因为它们试图寻找那些能让信徒相信宗教魔力的设备。

这里的一番话只是为了吸引潜在读者阅读本书。本书给出了许多理念和洞见，本序言所提供的只是寥寥几个而已。

威廉·鲍莫尔

致 谢

编撰本书的想法源于罗伯特·斯特罗姆和威廉·鲍莫尔之间的一席谈话，当时斯特罗姆受邀讲授一门企业家精神的课程。当我们讨论该课程的素材以及将企业家精神置于历史背景下进行研究的方法时，便形成了本书的理念。

由于我们都不是历史学家，需要帮助是不言而喻的。我们决定寻求其他首屈一指的学者一起撰写本书，因此很快想到了戴维·兰德斯和乔尔·莫克。不可思议的是，两人均坦诚地接受了我们的邀请。他们经过深思熟虑后，列出了本书大纲，乔尔还整理出一份潜在作者的名单。我们又一次很高兴地发现绝大多数作者很快接受了邀请，并对书稿的撰写计划表现出极大的热情。

为确保本书不是一本各类无关论文的拼凑之作，我们和编者拟定了一份需要作者处理的主题列表，当然这些主题允许有一定的灵活性。2006年10月在纽约大学召开的作者研讨会上，我们从主题内容和逻辑一致性两个方面对各章的草稿展开讨论和交流。经过一年多的修改和编辑，我们希望已成形的本书既具有启发性，又不乏可读性和连贯性。

尽管多数时候需要繁重的工作，但这项任务也是一种极大的乐趣，我们两人之间日益增进的友谊无疑是一项丰厚回报。除了自己的努力外，我们还要感谢阿丽思·弗雷利奇（Alyse Freilich）的宝贵贡献：她认真通读了全稿，细心且善解人意地对原稿进行编辑加工，最终把它们交付给出版社。多年来深受我们爱戴的同事苏·安妮·布莱克曼（Sue Anne Blackman）原本受委托督促本书的整个编写过程，在她不幸辞世后，阿丽思·弗雷利奇给了我们极大的安慰和实实在在的帮助。她和鲍莫尔在纽约大学的得力助手贾尼斯·刘易斯（Janece Lewis），为本书的最终成形付出了大量心血。

我们还要向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的同仁致以诚挚感谢，他们和我们早有合作，因此他们的有益帮助总是显得那么自然。最后，考夫曼基金会也给了

我们巨大的帮助，它不仅为本书的出版提供了非常鼓舞人心的支持，也许更重要的是，它将本书列为考夫曼基金会“创新与企业家精神系列丛书”的第二本。在此，谨一并致以衷心感谢！

威廉·鲍莫尔 罗伯特·斯特罗姆

目 录

“比较译丛”序

钱颖一

V

前 言

卡尔·施拉姆

VII

序 言 历史上的企业家

威廉·鲍莫尔

IX

致 谢

XV

导 言 全球企业和工业表现：一个概述

戴维·兰德斯

1

第一章 企业家：从近东起飞到罗马覆亡

迈克尔·赫德森

9

第二章 新巴比伦时期的企业家

科妮莉亚·温斯切

48

第三章 中东企业家精神：伊斯兰教制度的影响

铁木尔·库兰

76

第四章 中世纪欧洲的企业家和企业家精神

詹姆斯·穆雷

107

第五章 托尼世纪（1540—1640）：现代资本主义企业家精神之源

约翰·芒罗

129

第六章 荷兰共和国的黄金时代

奥斯卡·吉尔德布洛姆

188

第七章	企业家精神和英国工业革命	
	乔尔·莫克	220
第八章	英国的企业家精神：1830—1900	
	马克·卡森 安德鲁·戈德利	253
第九章	英国的企业家精神史：1900—2000	
	安德鲁·戈德利 马克·卡森	290
第十章	德国的企业家精神史：1815 年以后	
	乌尔里奇·文根罗特	326
第十一章	法国的企业家精神	
	米歇尔·豪	363
第十二章	美国内战前的企业家精神	
	路易斯·凯恩	394
第十三章	美国的企业家精神：1865—1920 年	
	内奥米·拉穆鲁	441
第十四章	美国的企业家精神：1920—2000 年	
	玛格丽特·格雷厄姆	481
第十五章	殖民时代印度企业家金融信贷供给的一项研究	
	苏珊·沃尔科特	529
第十六章	帝制晚期以来的中国企业家精神	
	陈锦江	561
第十七章	“二战”前日本的企业家精神：财阀的作用和逻辑	
	米仓城一郎 清水宏	597
第十八章	企业家精神的“有用知识”：历史的一些启示	
	威廉·鲍莫尔 罗伯特·斯特罗姆	627
作者列表		643
译后记		645
索引		649

导言 全球企业和工业表现：一个概述

戴维·兰德斯

西方的企业家精神和技术进步可追溯至几个世纪前，它们使世界面貌大为改观。尽管并非所有人都认可，但这至少是对历史记录的一种评价。一些不认同西方必胜论或诉诸亚洲（主要是中国）傲慢和优越论的学者认为，工业革命是企业家精神史上近期才产生的现象，并把它视为幸运事件（或不幸事件，取决于人们的价值观）。在他们看来，工业革命可以发生在任何地方，它只是碰巧出现在欧洲或英国，而且很大程度上要拜政治上的有利形势所赐，这些国家的海外霸权又强化了这种有利形势。从贸易、工业和技术在世界范围内的扩散来看，全球化来得甚至更晚（“二战”以后）。

但是，新近对比较世界史的研究和反思表明，全球贸易应追溯至 1000 年前中世纪晚期的亚洲和当时欧洲的经济的发展，以及随着非洲的转型和欧洲船舶驶入亚洲水域而来的世界开放或同时发生的欧洲对美洲的入侵。^① 随后几个世纪见证了西方逐渐变得比世界其他地区更富裕，它不仅超越了以往的世界领袖，而且在遥远的国度建立了殖民帝国，而所有这些均建立在更先进的科学知识、工业技术和商业企业的基础上。这种差距，以及落后地区对差距的反应——极度憎恨傲慢无礼、居高临下、慈善或无情、利欲熏心或掠夺成性的西方霸权，深刻影响了此后的绝大部分历史。

他们把富国和穷国之间的差距视为富国的过错，并把穷国的缺陷和弱点看成是其他人所作所为的结果。特别地，他们觉得发达的工业化国家并未用自己的实力帮助弱国，反而以此剥削和侵略弱国。因此，成功的帝国主义是罪恶势力。

^① 关于早期亚欧贸易和发展情况的一种新的重要分析方法，参见 Gordon (2008)。